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学说何以可能 ——基于索引分析和思想史源流的考察

安维复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唯物史观不仅包含生产方式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可能还包含文明学说。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有大量关于文明的命题及文本, 显露了一种超越资本文明的文明新形态。他们的文明学说有清晰的思考脉络和形成过程、相对独立的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解释力。采用词频和索引分析等文献研究方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语种著述中梳理他们的文明观, 发现他们沿袭了傅立叶、泰勒、拉伯克和摩尔根的探索, 用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来探究蒙昧—野蛮—阶级性文明—整体性文明的社会进步规律, 论证了“资本即文明”“文明暴行”“文明作为提高社会质量的实践”“文明具有整体性”等重大命题。这表明, 唯物史观可能是其生产方式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与文明理论的统一。这种理解可以更好地协调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说”(文明论)和“五阶段说”(制度论)的差异, 破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理论上脱节的难题, 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修正主义与激进革命派之间的对立问题, 有助于解释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经济发达或制度优越并不等于文明进步。文明在进步, 野蛮也在同步演进, 即打着现代化、全球化、数智化等文明旗号的野蛮(资本或霸权)在全世界制造“科技霸权”, 退回到技术封建制甚至技术奴隶制。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野蛮化的批判任重道远,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在此背景下,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学说值得被重新审视。

关键词:文明; 野蛮; 文明观; 文明的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 B03;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2-0075-12

2020年, 美国学者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写了一篇题为《罗莎·卢森堡与最后的斗争: 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退回到野蛮状态》(“Rosa Luxemburg and the Final Conflict—Socialism or Barbarism”)的文章, 回顾了卢森堡以马克思的文明观(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来批判资本主义野蛮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2021年, 有学者明确指出, 如果社会主义在全球失败, 那么21世纪将跌入野蛮(barbarism)的深渊^[1]。资本主义的野蛮性依然是美国金融危机、阿富汗战争、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等事件的重要推手。虽然卢森堡式的论战已不多见, 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却不断用“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退回到野蛮状态”(socialism or barbarism)说事儿^[2]。因此, 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必要为自己辩护, 更有必要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愈演愈烈的野蛮性及花样繁多的野蛮新形态, 即打着文明、人权、全球化、数字生存等旗号的野蛮。除了杀戮平民的战争等野蛮形式外,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制造新的“血汗工厂”, 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工人阶级再贫困化)催生了一轮又一轮经济危机, “在危机期间, 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 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 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

收稿日期: 2024-07-25; 修回日期: 2025-02-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经典文献编目及研究”(14ZDB019)

作者简介: 安维复, 男, 吉林九台人, 法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 联系邮箱: wfan1960@163.com

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3](406)}。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再次印证了所谓资本或文明本身就是野蛮,是一种“文明”的野蛮形式,或称为野蛮的新形态。传统文明观可以救治茹毛饮血、生灵涂炭等旧式野蛮,但却难以应对资本这种以“文明”的方式制造大量失业人口、不断挑起国家或种族对立、推行技术封建主义(technological feudalism)甚至科技霸权主义的新型野蛮行径。然而,有些西方学者却把资本的野蛮行径美化为“文明的冲突”。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把资本的“文明暴行”粉饰成正当的“文明冲突”。从这个维度来看,当代中国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何等的重要。就逻辑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立面是人类野蛮新形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文明暴行”。当然,任何理论只有作为人类思想史的环节才有价值,而学术研究的使命就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批判“资本=文明”的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3](404)}这意味着,所谓文明冲突并非宗教信念或国家利益的异见,而是因资本的“文明暴行”引发的全球性抵抗运动。

在文明问题上,我们不仅淡忘了罗莎·卢森堡,淡忘了《共产党宣言》,也淡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已经勾勒了一个呼之欲出的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学说关于又不同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按照学术惯例,要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自己的文明学说,至少需要提供如下理据: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与文明相关的大量文本(文献依据);其二,这些文本/文献有思想史上的贯通(学术史依据);其三,这些文本所表达的思想能自成体系(逻辑或理论依据);其四,这些文本中的思想有相对独立性或者能够归并到唯物史观之中(学科依据);其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与其他文明学说的本质区别(独特性依据)。这五点也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五个议题。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是否有文本依据?

无征不信,有一份证据说一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93)}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大量关于文明的论述,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论述,甚至同一论述在不同的语境中还有不同的含义,这些论述在不同语种中的理解也有差异。如,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5]但是恩格斯还说过,文明是“富人对穷人的战争”^{[6](195)},等等。前者是对资本文明的肯定,后者是对资本文明的批判。显然,如果不考虑语境,那么这两个命题是不协调的。有关“社会素质”(social quality/sociale Qualität)的含义在不同语种中也有不同^①。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文明的文本样态做总体性的整理,这也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明学说的逻辑起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卷帙浩繁且版本繁复,有些重要表述需要比对不同的版本,目前各版本都有利有弊。MEGA2在国际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但尚在编辑过程之中,无法进行系统的文本提取和分析。就文本考察而言,国际学界通常采用5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简称MECW)。例如Alex Callinicos等人编辑的《劳特里奇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

义指南》(*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ism and Post-Marxism*)的文献依据就以 MECW 为准(笔者正在翻译该指南)。

从技术维度看, MECW 更便于词频分析和索引方法, 因为英文“文明”(civilisation 或 civilization)等相关词汇没有复杂的性、数、格的变化。另外, MNCW 可以更方便地利用“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和“创世图书馆”(Libgen.rs)查询现存的 19 世纪文献。如马克思当年研读过的德文版《人类早期历史与文明发展研究》(*Forschungen über 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Civilisation*)难以查询, 但其英文版(*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却不难找到。

但 MECW 也有疏漏。按 MECW 的编排顺序, 第 24 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4—1883 年的著述,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在 1879—1883 年间完成, 但第 24 卷却没有收录。因而我们只能参照克拉德(Lawrence Kradner)在 1974 年编辑的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英文版, 其中包括《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要》(*Marx's Excerpts from Lewis Henry Morgan Ancient Society*)、《马克思对 B.法尔的〈雅利安人村社〉摘要》(*Marx's excerpts from John Budd Phear The Aryan Village*)、《马克思对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 年伦敦版)一书摘要》(*Marx's Excerpts from Henry Sumner 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马克思对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摘要》(*Marx's excerpts from John Lubbock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等四部笔记。但是克拉德的这个版本却没有收录马克思关于 M.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一书的笔记, 该笔记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 45 卷, 按该卷提示, 此笔记刊于《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7], 该书可能没有英文版。此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也没有收入《马克思对 B.法尔的〈雅利安人村社〉摘要》。除此之外, 笔者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查询到马克思写于 1835 年 8 月份的宗教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 至 14 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 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8], 其中提到“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 ……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的命题, 同样没有被 MNCW 收录。这就意味着 MECW 并不齐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也与之类似。

更大的难题在于, 即使利用词频或索引分析等方法可以查到“civilisation”等术语, 但有些文明议题中并不一定出现“civilisation”这个术语。检索 MEGA2 和 MNCW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有些著述可能存在大量的“civilisation”术语, 却在“主题索引”中不存在; 有些“主题索引”中有“civilisation”词条, 却在词频查询中找不到或对应不上。以 MECW 第三卷为例, 按词频检索“civilisation”出现了 28 次, 但主题索引却只标出了 81、295、308、478 等四个页码, 漏掉了第 221 页上的“劳动分工随文明而增加”(division of labour increases with civilisation)^{[9](221)}等重要命题。这就意味着, 包含“文明”术语的语句未必就是有价值的文明话题, 而有些文明论题不一定出现“文明”术语。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中的文明议题与“文明”术语之间的异同, 避免望文生义。同时, 各种分析技术都有局限性, 词频分析和主题索引分析各有利弊, 因而需要多种分析技术的综合使用, 命题与语境的“解释循环”等传统诠释方法依然不可替代, 有时“交叉共识”可能更靠谱。

考察显示, “civilisation”在 MECW 中除书信外按词频查询出现了 466 次, 主题索引出现了 98 次; 书信(第 38—50 卷)中可查到 45 次; 《人类学笔记》中文版有 55 次(因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收入了马克思关于 M.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一书的摘要), 英文版有 37 次(未收录马克思关于 M.柯瓦列夫斯基一书的摘要)^[10]。即使去掉书眉和题名等无效次数,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中的“civilisation”或相近语义也还有 500 次左右。这些数据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检索到文明的概念与性质、文明学术史及方法、文明与野蛮的范畴、文

明多样性、文明发展规律、资本文明批判、未来文明设想等的出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分类及出处作出几个有理据的判断。

表 1 中的数据是“civilisation”在 MNCW 中的词频和索引分析的具体数据。第一行是卷号，第二行是词频数据，第三行是主题索引的次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MECW 的卷号大体上是按文献发表的时间排序的，但第 28—34 卷是 1857—1863 年经济学手稿，第 35—37 卷是《资本论》三卷，第 38—50 卷是书信，表 1 中的符号“—”指无数据。表 2 是有关“文明”(civilisation)在 MNCW 中的主题索引(枚举)，“/”前的数字是页码，“/”后的数字是卷数，如 415/3 表示 MNCW 第 3 卷第 415 页载有文明概念和特性的论述。

表 1 “civilisation”在 MNCW 各卷出现的频次

卷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频次	4	3	28	50	17	64	9	16	3	14	6	9	5	9	2	8	9	1	10	2	2	1	7	17	21	67	6	12	13	12	12	3	8	4	17	5	8	18
索引	—	—	4	1	10	0	6	7	2	5	8	6	1	3	3	9	5	1	1	—	—	—	—	4	5	8	4	—	—	—	—	—	—	—	—	—	—	4

注：表中的数据由笔者根据 MNCW 整理得出。

表 2 “civilisation”主要用法出现的页码和卷数(不完全统计)

主题词	出处：页码/卷号
文明概念/特性	415/3; 478/3; 294/4; 64/5; 293/24; 129/25; 248/25; 134/26; 136/26; 256/26; 274/26; 275/26; 234/28; 504/28; 22/29; 107/32; 127/34; 5/38; 97/38
文明学术史	220/5; 616/4; 618/4; 538/6; 293/24; 612/25; 131/26; 210/27; 46/28; 117/28; 170/29; 191/30; 317/30; 182/31; 534/36; 66/38; 691/38; 192/44
文明与野蛮	312/3; 434/6; 423/7; 214/8; 158/14; 160/14; 439/16; 118/19; 268/22; 501/24; 131/26; 136/26; 139/26; 276/26; 216/28; 24/40
文明多样性	423/3; 373/6; 399/6; 410/6; 488/6; 531/6; 628/6; 116/7; 401/10; 624/12; 268/22; 501/24; 18—19/27; 504/28; 44/30;
文明发展规律	531—532/6; 293/24; 248/25; 471/25; 131/26; 134/26; 136/26; 139/6; 181/35
资本文明批判	308/3; 423/3; 461/4; 618/4; 488/6; 573/7; 276/2; 234/28; 572/28; 22/29; 536/30; 127/34
未来文明设计	95/24; 276/26; 243/27

注：表中的数据由笔者根据 MNCW 整理得出。

第一，“文明”术语或类似表述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始终，最早见于马克思中学时代撰写的“宗教作文”，但集中出现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 次)、《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10 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60 次)以及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55 次)。这些著述论及了文明的概念和未来文明设想等话题。这至少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是存在的，其存在是有文献依据的。

第二，虽然“文明”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心的话题，但是他们的代表性著述都形成于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晚期。这不同于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唯物史观经典著作，也不同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资本论》等剩余价值理论经典著作。我们有理由猜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期思想经历了类似“文明观转向”的新探索，即他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生产方式理论到剩余价值理论再到文明理论的三次革命性转换。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文明的论述包含了对文明的性质或特性、文明的发生过程以及文明的未来趋势等的探讨。尽管这些论述在主旨上不如《共产党宣言》那样清晰、在范畴上不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规范、在逻辑上不如《资本论》那样严密，但是这至少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晚期提

出了别有特色的文明理论，而且不同于也不可归并到生产方式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是否有思想史依据？

理论研究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或学说都是人类思想总体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的确立不仅在于他们使用了多少与文明相关的概念或说出了多少文明论题，还在于这些概念或命题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

马克思的文明学说与西方基督教信念有关，这一点可以在他中学时代的“宗教作文”中得以证实，“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8]。这种文明与迷信(野蛮)的二分法一直贯穿马克思有关文明论题的始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得出了“文明本身就含有原始的野蛮性”(civilisation contained within the crude barbarism of need)^{[9](311)}的论断，提出了“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等命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阶级性，“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404)}。

文献查询结果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没有专门研究过文明问题。但在19世纪五六十时代，当马克思移居伦敦开始转向经济学(史)研究时，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研读了多部文化(文明)史著作^②，如W.瓦克斯穆特(Wilhelm Gottfried Wachsmuth)的《文化通史》(*Allgemeine Kulturgeschichte*)、克列姆(Gustav Klemm)的《人类文化通史》(*Allgem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等。泰勒(E.B.Tyler)^③的《人类早期历史及其文明发展研究》是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且留有马克思阅读的痕迹。当然，马克思对文明议题的系统研究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明证就是篇幅众多的《人类学笔记》。这些笔记记录了马克思思考文明问题的心路历程，但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成文。

恩格斯对文明议题的研究始自19世纪40年代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著作考察了技术/资本主义文明将工人阶级推入悲惨世界的残酷现实。恩格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论商业》中的文明思想。他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A Fragment of Fourier's on Trade*)中说：“傅立叶把社会发展区分为四个阶段，蒙昧时期(savagery)，宗法时期(patriarchate)，野蛮时期(barbarism)和文明时期(civilisation)，这四个时期如同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不同发展阶段。”^{[11](642)}当然，由于不了解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傅立叶不可能发现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但是不能否认傅立叶文明论的开创性意义。

19世纪70年代初，恩格斯接触到包括摩尔根《古代社会》在内的许多文明理论。1871年8月9日他写信给拉夫罗夫(Pyotr Lavrov)，开了一份书单，包括乐琪(W.E.H. Lecky)的《理性主义精神史》(*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12]，泰勒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3]，拉伯克(Lubbock)的《文明的起源》(*Origin of Civilisation*)^[14]，梅奈(Maine)的《古代法律》(*Ancient Law*)^[15]等。恩格斯正是通过研读这些著作，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发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创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的奠基性著述。他不仅“完成了马克思的未竟事业”^{[16](131)}，而且推进了摩尔根和傅立叶的文明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就在于阶级压迫”(the exploitation of one class by another is the basis of civilisation)^{[16](275)}的历史局限性，确立了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内核的新型文明理论，形成了蒙昧、野蛮、阶级性文明到整体性文明的历史发展观。恩格斯不仅将傅立叶等人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而且也使得空想社会主义的文明理论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理论。

就人类思想史特别是文明史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是在摩尔根和傅立叶等人的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摩尔根和傅立叶的文明理论是当今文明理论绕不过去的经典,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也有突出贡献,大英百科全书和维基百科在介绍摩尔根及其《古代社会》的时候,都会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述和思想^④。当代任何严肃的文明议题,都不能绕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思想。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最终目标就是建成一个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都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团结的时代”^[17]。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一书中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却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非欧洲社会取得了现代化和革命的成功。”^[18]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源自傅立叶、泰勒和摩尔根的文明理论,但又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设想了新型文明,这种文明学说又启发了后世的各种文明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能否自成体系?

一个理论的成立在于能“自成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总体性”的(卢卡奇语)或称“一块整钢”(列宁语)的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也不例外。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不是碎片化的知识拼图,而是在概念与命题以及命题之间保持可分析性的逻辑规制,具有学术论证中的“协调性原理”和“无矛盾性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之所以能自成体系,首先在于它有其基本范畴——与野蛮相对的文明概念。如上所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中有关文明术语或论断的考察显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明学说的逻辑起点是发现了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野蛮性的内在矛盾,其实质是文明的阶级局限性。其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资产阶级文明对工人阶级的野蛮性——“带着文明和人性面具的野蛮性”(this brutality was chiefly carried on under the mask of civilisation and humanity)^{[11](461)}。其二,马克思也在《工资》等著述中证实了恩格斯的观察,即“文明与野蛮相伴而生”(barbarism reappears but created in the lap of civilisation),“野蛮作为文明的病症”(barbarism as leprosy of civilisation)^[19]。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他们基于唯物史观发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阶级性和野蛮性的内在机理及其世界性传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0]。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1](35-36)}。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阶级(局限)性及被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但范畴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以抽象概念来表达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条关于文明的纲领性说法:“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22]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civilisation)有时是通用的,比如它的德文和英文是可以互译的^⑤。所谓文明的哲学编史纲领(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按西方学术惯例以及马克思本人的用法,应为综合或辩证的文明(史)观,是文明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道德伦理)的统一,个人品行与“社会质量”(素质)的统一,技术与制度的统一,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就范畴表述而

言，除了文明作为“哲学的编史纲领”(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外，还有“文明就是提高社会质量的实践”(die Civilisation eine Sache der Praxis, eine sociale Qualität ist)^[23]、“文明具有整体性”(the whole of civilization)^{[24](191)}、“国家的文明作为整体”(civilisation of the country as a whole)^[25]，等等。

文明的整体性及文明观的确立源自人的整体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的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4](715)}，真正的文明才可能到来，“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6]。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的纲领性文件。如果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为其文明学说提供了一个“哲学的编史纲领”，那么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的基本构架，即人类文明经历了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而文明阶段又包括具有阶级局限性的文明和消除阶级局限性的文明两个阶段。“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27](193)}在这种高度文明的社会中，恩格斯借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7](198)}。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思想标志，《资本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标志，那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的经典。它基本上涵盖了文明的定义、文明的思想体系、文明的发展轨迹、文明的社会批判、新型文明重建等独立学科或思想体系所必需的学术构件。

此外，恩格斯还设想或设计了一条通向文明社会的可行路径：“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6](548-549)}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想到的是，150年后在古老的中国会诞生“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新形态秉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许，延续着德行天下的古老东方神话。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实现了思想上的贯通：它以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为支点，洞察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本性，期望一种最适于人类自由本性且用最人道的方式才能实现的理想社会。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不是碎片化的知识，而是具有总体性的“一块整钢”。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与生产方式理论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能否成立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假使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文明学说，那它在唯物史观中居于何种地位？它是否可以被归并到生产方式理论之中？是否有必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论域？

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是生产方式理论还是他们的文明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原理和批判指向。但是这并

不能消弭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有所不同一样，详见表 3。

第一，思想旨趣不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方式理论主要讨论生产力与财产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更关心财富的创造及其公平的分配，在这里技术进步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而追求技术进步则往往遮蔽了阶级之间的野蛮关系，也就是技术异化问题。与生产方式理论相关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所追求的主要是文明对野蛮的超越，即使这种野蛮具有技术/生产的合理性也依然在受批判之列。概言之，生产方式理论更关心社会进步，而文明理论则更关心人的全面发展。

表 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与生产方式理论及剩余价值论的比较

生产方式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	文明理论
思想旨趣	财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否匹配	剩余价值分配是否合理	文明进步何以消除野蛮
学科体系	历史观或编史学	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	文化人类学
理论来源	政治经济学与启蒙政治理论	古典经济学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
范畴体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劳动力商品与剩余价值	野蛮与文明、文明的“恶性循环”
历史规律	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变迁	从“物的依赖”到“人的依赖”	蒙昧—野蛮—野蛮的文明— 消除野蛮的文明

第二，学科/学术体系不一样。生产方式理论属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主要探讨人的经济行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而文明理论则属于人类学、历史学与文化学的范畴，更多地讨论技术进步、行为方式、观念体系和文学艺术，等等。研究生产方式理论的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家，而研究文明理论的则是哲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等人文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方式理论和文明理论具有不同的学科归属。

第三，理论来源不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方式理论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说和启蒙学派的政治学说，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主要来自当时的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如傅立叶的《论商业》、泰勒的《人类早期历史及其文明发展研究》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中的文明理论。

第四，范畴体系与话语方式不一样。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范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清晰准确的表述；而文明理论的基本范畴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其中包括整体性文明与阶级性文明、器物文明与制度文明、携带野蛮的文明与消除野蛮的文明，等等。当然，这两对范畴也有交叉关系，但就基本词义而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要描述生产的效率及经济和法律制度等制度安排，而文明与野蛮则重在刻画人类活动的层级和方式，如人的主体性状况、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简言之，生产方式理论重在经济社会进步，而文明理论则重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五，对历史规律的描述不一样。众所周知，生产方式理论对历史规律的描述主要是技术、产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变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对历史规律的描述则是蒙昧阶段、野蛮阶段、阶级性文明(带有野蛮的文明)阶段、整体性文明(彻底消除野蛮的文明)阶段。这两种历史规律有重合之处，但其差别也是明显的。严格说来，仅就野蛮和文明的二分法而言，资本主义文明只是野蛮的高级阶段或一种新型的野蛮制度。概言之，生产方式理论支持“五种制度”说，而文明理论则支持“三阶段”说。

上述分析至少隐含着两个重要思考：其一，在经典唯物史观体系中，除了生产方式理论，还有文明理论。其二，人类发展中生产方式的更替与文明的进步可能高度相关但未必一致，资本主义固然存在与文明相对立的野蛮问题，社会主义在它的初级阶段可能依然面临文明与野蛮的矛盾，如粗放的生产方式、“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等问题。只有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才显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与其他文明学说的比较

一个学说仅仅能够自圆其说依然是不够的，一个学说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否比其他同类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之所以行，在于它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文明学说。如前文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就有傅立叶、泰勒、摩尔根的文明理论，当代也有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28]、汤因比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等关于文明的重要著作。近年来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特别是拉美学派在研究帝国—殖民体系时往往强调民族甚至种族文化/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性。比较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更具说服力。

第一，在文明范畴的界定上，将资本(主义)等同于文明依然是主流观点。韦德(J. Wade)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历史考察》中就提出了“资本是文明的代名词”^[29]的命题，M.韦伯、亨廷顿和福山都认为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比较而言，马克思并不否认当时的欧洲属于“文明社会”或“文明国家”，但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野蛮的文明，是资产阶级的“文明的暴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学说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价值，也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在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交流等问题上，孔德、傅立叶、摩尔根、韦伯、福山等都认为文明是一个线性的进化过程，大都经过蒙昧、宗法、野蛮等阶段而趋向某种文明^[30-31]，因而西方或欧洲文明具有优越性^⑥。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等都认为文明是多样的，但他们大多认为不同的文明或文化之间必然存在敌对或者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的破坏，反对“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1](36)}。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持有文明多元论尚待考证，但他们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是有据可查的。

第三，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上，孔德、韦伯、亨廷顿和福山等拒绝对资本主义文明做实质性的批判，但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的文明论者亦不在少数。如傅立叶开启了社会主义者从文明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先河，但难以逾越空想社会主义的藩篱；斯宾格勒以生命周期的自然现象来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必将衰落的规律，但可能失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洞察^⑦。相比之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基于文明的整体性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视界。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更富有学理性，更加彻底，更富有人学意蕴。

第四，在未来文明设想的问题上，绝大多数文明论者都在“解释世界”，孔德、傅立叶和摩尔根止步于“蒙昧—宗法—野蛮—文明”的进化阶梯，丹尼尔·贝尔止步于“后工业社会”(相当于21世纪初的“知识经济时代”)，福山止步于当代资本主义文明^⑧，汤因比设想中国文明可能比美国文明和苏联文明走得更远，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理据^⑨。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改造世界”特别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出发，按照文明的整体性，特别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理论来规划未来文明的宏伟蓝图。“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6]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有能力同各种文明理论进行对话，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

六、结语

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布局，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就学科体系而言,学科分化或专业化是理论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近十几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拓展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史学等多个专业领域。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在晚年转向了文明理论研究,形成了一大批有关文明问题的重要著述,重写或改写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经典表述。挖掘和推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必要的,是有文献和思想史依据的,文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值得重视。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体系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第二,就学术体系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在生产方式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形成的一种(尚未完成的)理论。其实质是用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等范畴体系来辨析社会问题以及进行社会批判的理论形态,形成了文明与野蛮、文明阶级性与文明整体性等范畴,论证了“文明即资本”“文明的恶性循环”“文明暴行”等基本命题,并借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野蛮性的生成机理和历史趋势,是不同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另一种论证,有助于说明生产方式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难以解释的社会问题,也是第三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和设计未来社会的理论依据。以文明和野蛮的辩证关系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体系。

第三,就话语体系而言,生产方式理论更倾向于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制度更替,剩余价值理论主要阐发资本在生产活动中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学界长期争论的“三阶段说”和“五阶段说”,其实是文明尺度和制度尺度的区别^[32-34],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可能不完全聚焦于哪种制度更合理,而聚焦于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否更合理,也就是“两个解放”。从文明尺度看,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存在文明问题,资本主义自不必说,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经历从不文明到文明、从单一文明到复数文明、从文明固有形态到文明新形态的递进过程。苏联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如“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可能也面临“文明”尺度的检视。文明尺度不仅可以衡量资本主义,同样也应该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评价尺度,对以往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回顾,也应该包括对其文明的检视。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学说的话语体系,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我检视,都是必要的,文明与野蛮的辩证依然是当代有意义的话语方式。

基于上述考量,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学说值得重新挖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地位还有待于从人类之间、时代之间、世界之间的高度上加以深入论证。

注释:

- ① 根据“社会质量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Social Quality, IASQ)和维基百科等的资讯,英文“social quality”与德文“soziale Qualität”基本上是可以通用或互换的,是与“living quality”同等级的用语且通常连用或互换,“living quality”译为“生活质量”已成惯例;“social quality”是一种通过社会或公共政策来理解社会的方式,它关注构成美好生活的各种要素,如“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社会团结”(social cohesion)等。因此将“social quality”或“Soziale Qualität”译为“社会质量”可能更为精准。
- ②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2009年中译本《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的第489页上有个脚注:“(51)爱·伯·泰勒《人类原始历史》,亨·弥勒译,莱比锡版(无出版日期)第240页。”核对MNCW第36卷发现,中译文略掉了原文中的一个尾注(58),它提及马克思对该书的阅读及其收藏情况,参见MNCW, Vol.36, 第438、534。这个细节说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的时候,已经在收藏和研读当时有关文明的著述。
- ③ 泰勒(E.B. Tyler, 1832—1917)是英国人类学家,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他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1871)等著作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领先于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马克思对泰勒著作的研读先于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读。另外,傅立叶的《论商业》写于1848年,傅立叶有关蒙昧—野蛮—文明的进化规律先于泰勒。
- ④ 例如维基百科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评价,就提及恩格斯的“起源”的学术影响(<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cient>

Society)。

- ⑤ 这里特别提请注意，中文版中的“文化史”在英文版中是“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英文版原文如下：(2) The relation of the hitherto existing idealistic historiography to realistic historiography. In particular what is known as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which is all a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states. (In this context something can also be said about the various kinds of historiography hitherto existing. So-called objective, subjective (moral and other kinds), 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 参见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2, New York: Intl Pub Co Inc., 1989: 46.
- ⑥ 实证论者孔德可能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始作俑者，而 M. 韦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论证则有着广泛的影响。韦伯认为，西方文明优越的根源在于西方人在数理知识上的“人种学优势”(anthropological side)，参见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1992: Author's introduction. xlii。
- ⑦ 斯格勒所说的“西方没落”并不是指资本主义消亡，而是指西方文明是一个从发生到停止的过程，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运动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冬天已经来临。
- ⑧ 福山在他的《历史终结》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20 世纪人类向何处去的唯一答案就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Macmillan, Inc. 1992: xiii.)。
- ⑨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指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融为一体。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2: 392-393.)

参考文献：

- [1] ANGUS I. Socialism fails: The spectre of 21st Century barbarism [EB/OL]. (2021-01-24) [2024-10-17]. <https://janataweekly.org/if-socialism-fails-the-spectre-of-21st-century-barbarism/>.
- [2] MÉSZÁROS I. Socialism or barbarism: From the “American Century” to the crossroad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36.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MARX K. 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 [M]. Frankfurt/Main, New York: Campus-Verl, 1977.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49.
- [9]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M]. New York: Intl Pub Co Inc., 1973.
- [10] KRADER L.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M]. Assen: Van Gorcum & Comp. B.V., 1974.
- [11]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4[M]. New York: Intl Pub Co Inc., 1975.
- [12] LECKY W. E. H.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vol 2 [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69.
- [13]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vol 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71.
- [14] LUBBOCK J.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M].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1921.
- [15] MAINE H S. 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80.
- [16]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26[M]. New York: Intl Pub Co Inc., 1990.
- [17] TOYNBEE A. A study of history[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2: 227.
- [18] HUNTINGTON S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52.
- [19]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M]. New York: Intl Pub Co Inc., 1976: 434.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56.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 [23]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3[M]. Berlin: Dietz Verlag Berlin, 1985: 548.

- [24]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M]. New York: Intl Pub Co Inc., 1988: 191.
- [25]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2[M]. New York: Intl Pub Co Inc., 1989: 107.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28.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8] SPENGLER O. Decline of the West[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 [29] WADE J.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M]. 3rd ed. London: Wilson, 1835: 161.
- [30] LUXEMBURG R. The junius pamphlet: The crisis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M]. Zurich: Politische Schriften, 1915.
- [31] HENRY L.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M]. 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877.
- [32] 韩庆祥.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7): 100–114.
- [33] 杨金海. 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深远历史意义[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7): 10–17.
- [34] 安维复.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性考察[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Z1): 4–11.

How can Marx and Engels' view of civilization be possible? Based on index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thought history

AN Weifu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t only includes production mode theory, surplus value theory, but may also include civilization view. This is because Marx and Engels' writings contain numerous propositions and texts about civilization, revealing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that transcends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Their civilization view have a clear thinking path and formation proces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ategories and unique ideological explanatory power. By adopting such literature-research methodology as word frequency and index analysis, and after combing through Marx and Engels' civilization view scattered in their multilingual writing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y have followed the exploration of C. Fourier, E.B. Tylor, J. Lubbock and H. Morgan, and employed the dialectics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to explore the 3 stages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regularity, including savagery,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from the civilization with class limitations to the civilization without class limitations), hence demonstrating such essential issues as “capital being civilization” “civilized outrage” “civilization as the practice to improve social quality” “civilization having its entirety.” This shows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y be the unity of its production mode theory and civilization theory. Such understandings may better coordin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stage theory”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five-stage theory” (system theory), crack the nut of theoretic disjunc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help overcome the binary opposition conflicts in Marxism between revisionism and radical revolutionary, and help explain the historical lesson about Russian disintegration. Neither developed economy nor superior political system means advanced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is advancing, so is barbarism alongside. That is to say, barbarism in the name of modernization, univers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the like, is now making “brain in the bowl” “digital refugee” and even “digital scorched earth,” retreating back to technological feudalism and even technological slavery. It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launch critique at civilization barbarism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propos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irreplaceable ideological value. In this context, Marx and Engels' civilization view is worthy of further survey.

Key words: civilization; barbarism; civilization view; integrity of civilization

[编辑: 胡兴华]